

海外傳衣鉢

——李穡《牧隱詩藁》的唐詩 接受與物候感知

廖美玉

提 要

李穡年十四始學詩，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為記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又歷經元、明及高麗、李朝兩國六朝的跨國易代，除了在父母國由高麗到李朝外，尚有中原的“遼前宋後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的經歷，朝代的興亡更迭與個人的進退出處，以及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終身吟詠不輟，留下豐富的詩篇與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題。李穡習朱子學，深得歐陽玄之賞識，視為海外傳衣鉢者；而李穡又以李杜與程朱並列，成為一生用力所在。是以本文從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切入，探討李穡以杜甫為“正宗”而上溯《南風》，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物理，最為深微而親切，從而跳脫抒情傳統所側重的“悲秋傷春”主題，體現出以春天為主軸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的自在清明。對於中國文化在三韓的發揚與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李穡 唐詩 海外衣鉢 物候感知 與天相親

一、前 言

李穡(1328—1396),字穎叔,號牧隱,朝鮮忠清道韓州人,因慕華風^[1],在中原的學仕歲月約有五年^[2],一生往來兩國,歷經“遼前宋後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a_004_231b*),又身處高麗(918—1392)與李氏朝鮮(1392—1910)易代之際,多次出使元、明兩朝,著力發揚性理之學,執掌文翰達數十年之久^[3],備受尊崇。李穡習朱子學,深得翰林承旨歐陽玄之賞識^[4],文中每道及“早知中國曾青用”(《通州》,a_003_535a)的經歷,有《紀事》詩云:“衣鉢誰知海外傳,圭齋一語尚琅然。”(a_004_139d)清楚映現歐陽玄期許海外傳衣鉢的記憶。權近《朝鮮牧隱先生李文靖公行狀》稱其:“在學三年,得受中國淵源之學,切磨涵漬,益大以進,尤邃於性理之書。”(a_003_506a)恭愍王更直指“穡學問,舍肥膚而得骨髓者也,雖中國亦罕比”(a_003_506a)。都以“中國”為指標衡量其學問淵源與成就,李穡詩文亦一再表明推尊“中國”之心^[5]。李穡一生最大成就在推廣朱子學說,史稱“東方性理之學,繇是乃明”^[6]。事實上,李穡喜讀唐詩、用唐詩韻,尤以跨國生活經驗、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有《牧隱詩藁》35卷。目前研究所關注多其性理之學及詩文集的史料價值,專門研究李穡詩的論著相形較少^[7],李昞《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學派對〈論語〉的解釋》即注意到李穡詩與朱熹學說的關係,云:

李穡把《論語·泰伯》進講之後將其自己的所感用漢詩表達出來。如果仔細考察其漢詩的內容,就可以發現李

* 按:此為“韓國古典數據庫”(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MM)中編號,下同。

穉對《論語》的理解是以朱熹的《論語集注》為根據的……如果比較以上朱熹的注釋和李穉的詩句就能發現李穉的“道體”、“器數”、“操存省察”等詩句其實是借用了朱熹的。^[8]

李穉年十四始學詩，終身吟詠不綴，甚至以“詩魔”自許^[9]，尤多離仕退居、性分自足之作，恰可於詩中映現性與天道。其《伯共說》特別針對《論語·公冶長第五》所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10]，提出深見，云：“性與天道，夫豈聲於仲尼之口，而後聞之哉。夫子之申申夭夭，侃侃闐闐，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者也。”(a_005_078c)理微物顯，性與天道本就很難通過語言文字的傳述，因此，李穉以孔子閑居的申申自如、夭夭和樂，與大夫交談的侃侃直言、闐闐明辨^[11]，藉由日常生活與行事來體現“性與天道”，其《仲至說》亦指出：“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淪於民生日用之間，著於聖賢功化之表。”(a_005_081a)，是以《論語》所載孔子言行，乃至詩書禮樂、典章文物，其關乎民生日用者，無非性與天道的具體體現。而李穉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為記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憶梅花》云“程朱道學窮天命，李杜才名騁《國風》”，李、杜、程、朱共同成為其一生用力所在。是以本文以《牧隱詩藁》為研究文本，分別從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兩方面加以申論，期能對李穉的詩學淵源及其生活日用所映現的性與天道有所闡發。

二、由杜詩典範到落落 餘師的唐詩接受

李穉在中原時有“衣綻尚餘慈母綫，帙多難盡古人書”(《自詠》，a_003_524b)之歎，對於中原文士的圖書收藏與讀詩風氣，留下深刻印象，《又賦八句贈祕書》詩云：

我昔觀光在帝都，每從縫掖謁鴻儒。家家文集堆如岳，處處詩聯走似珠。盱矣莫窺愁滿眼，掬之不得汗流膚。祕書異日如相示，天幸方知在老夫。(a_004_079c)

相較於南宋遺民“九儒十丐”之說^[12]，李穡所見元都依然是儒風鼎盛，家家文集、處處詩聯的景況，自是心嚮往之，成為返鄉後的生活實踐藍本，如其《自詠》所云：“圖書繞我青山好，門巷無人白日遲。回首中原三萬里，炎風朔雪各生涯。”(a_004_200d)儘管中原與三韓的地理位置與物候大異其趣，圖書與江山則是李穡鄉居的最佳伴侶。他尤其嗜讀唐詩，其《雪谷詩稿序》云：

天之厚予嗜，何其多乎哉。往年在京師，同開吳縣尹家，有唐百家詩，從借其半讀一過。間又獲時之名卿才大夫家集讀之，雖不盡解深淺，皆足以自樂。及東歸，囊唐詩十餘秩，將以資韓山、《考槃》之樂。謬為□□主知，供職是務，不能專意吟詠間，既以自傷，又嘗恨前輩著述之不多見。(a_005_052d)

除了在京師時已讀過唐百家詩的一半，歸鄉隱居的選擇也還是唐詩。又其《偶吟三首》的“抽毫書晉字，鍊句學唐詩”(a_004_211c)，即以晉字、唐詩為書法與詩歌的兩大指標，《西松回自龍頭》的“細讀唐詩今幾首，他年開口便成章”(a_004_229d)，對唐詩可謂樂之者，在詩歌創作中所映現的唐詩接受，更是豐富而多元，對時人學唐流弊乃多所批評，如《讀舉子詩賦有感》云：“唐風崇律賦，流弊盛東方。音韻偕平側，文章局短長。揚清仍激濁，配白故抽黃。芻狗終安用，令人自歎傷。”(a_004_297d)律詩、律賦曾經是唐代科舉考試的文體，時至三韓仍盛行不衰，惟時人所取乃平仄、對仗等格律形式，恰為李穡所不取。李穡所取者為兒時即愛讀的韋應物(737—792)詩，《稼亭所畜唐詩中有韋蘇州集，兒時愛讀之，後為人借去不還。遊燕時又得一本於吳宗道縣尹，東歸而又為人借去，今未知在誰氏也。吟成一首》前

半云：“唐詩氣頗短，稍平唯蘇州。初看似清絕，熟讀方優游。山齋即官府，野興雜民憂。”(a_004_020d)指出韋應物詩風清淡高遠，善於感受自然物態而饒富生意，安史亂後長期擔任地方官，有《寄李儋元錫》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全唐詩》，卷188，頁1920)集優游清絕與憂時愛民於一身，是以李穡兒時愛讀、終身難忘，以致許為古今罕見。因此，李穡在唐詩接受上，乃能延續宋、元的杜詩典範而另有其詩學取徑。

(一) 回歸自然法則的杜詩典範

杜甫(712—770)是跨安史之亂的一代，見識過開元全盛日的富庶繁華，安史亂起後更是備嘗流離之苦，亂後遠走巴蜀、浪迹兩湖，一生行事心迹，都在詩中，晚唐孟棨既稱：“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又記載李白戲杜之作：“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將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13]復經宋元的推尊，杜甫為“詩聖”的典範地位已告確立^[14]。李穡對於杜詩，可謂知之、好之且樂之者，一再以“大(太)瘦生”自許^[15]，其《前篇意在興吾道大也，不可必也。至於詩家，亦有正宗，故以少陵終焉。幸無忽》更直指杜甫為“正宗”，全詩分四部分，首四句云：

詩章權輿舜《南風》，史法隱括太史公。以詩為史繼三百，再拜杜鵑少陵翁。(a_004_285d)

李穡雙拈詩、史，把詩章的源起溯自相傳為舜所作的《南風》之歌，從司馬遷的《史記》中隱括史法規範，視杜甫為結合詩與史，成為繼《詩》三百篇以後開創出“以詩為史”的正宗詩人。《南風》之歌始見於戰國的《尸子·綽子篇》，記載了“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二句^[16]，至魏王肅編撰《孔子家語·辯樂解》而成四句，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17]全詩主要就季節性的風向而言，夏季由南方海洋吹來的季風，帶來溫暖濕潤的氣候，有利於農作物的成長，因而可以阜民財、解民愠。司馬遷《史記·樂書》即以《南風》為“生長之音”^[18]，李穡以《南風》為詩章之始，著重在以人文呼應自然之文，尤其是結合自然物候而長養天下蒼生的帝王之歌。隨著人事浩繁，孟子已觀察到“詩亡然後《春秋》作”^[19]，李穡標舉以“究天人之際”為撰述宗旨之一的《史記》^[20]作為典範，推崇杜甫開創出的“以詩為史”的新典範，所舉範例為《杜鵑》詩的“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21]。主張在人為典章制度、禮法律則大興之後，回歸大自然與古聖賢的法則。可見李穡在詩學傳統的建構上，有意以上古的天人合一觀念為核心。因此，李穡對同樣推尊杜甫的江西詩派乃有不同見解，接著四句即云：

遺芳賸馥大雅堂，如聞異味不得嘗。如知其味欲取譬，
青天白眼宗之觴。(a_004_285d)

黃庭堅《大雅堂記》主張：“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22]黃庭堅雖提出以《詩》、《騷》為咀嚼杜詩“意味”的逕路，卻否定杜詩中林泉人物、草木魚蟲的“物物皆有所託”，轉而講究襲古人字句以求新意的鍛鍊工夫。李穡則認為江西詩派學杜乃“如聞異味不得嘗”，並以崔宗之為例闡釋“知味取譬”的意

蘊。崔宗之爲杜甫《飲中八仙歌》吟詠對象之一，杜甫許以“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全唐詩》，卷 216，頁 2259），以少年崔宗之的蕭灑傲岸、任情不羈爲喻，形容能够不受世俗拘染，纔能純任自然，寫出極其生活化的詩歌作品。故接著四句云：

律呂之生始於黍，舍黍議律皆虛語。食芹而美是野老，
盛饌那知王一舉。（a_004_285d）

李穡特別舉黍與芹爲例，強調詩歌作品不能悖離民生，杜甫詩中即不斷出現“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遣興三首》，《全唐詩》，卷 218，頁 2286），“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大雨》，《全唐詩》，卷 219，頁 2310），“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遣意二首》，《全唐詩》，卷 226，頁 2438）等，時時照顧人們生存的需。杜甫甚至把天然資源、民間野蔬與帝王作連結，諸如“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槐葉冷淘》，《全唐詩》，卷 221，頁 2342），“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赤甲》，《全唐詩》，卷 229，頁 2498）等，呼應詩歌源頭的《南風》之歌，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是以結四句乃云：

爲詩必也學斯人，地位懸隔山難因。圓齋肯我一句語，
只學少陵無取新。（a_004_285d）

李穡標舉杜詩爲“正宗”的憑據，顯然大不同於江西詩派的講究聲律句式與爭奇創新。其《青陽李三中見訪既去，南陽洪亞相又來，病僕蹙然是喜，況於高軒乎，錄之以爲閑居盛事》有云：“花蕊蜂鬚風細細，芹泥燕嘴日遲遲。相君若問閑中味，費卻精神只是詩。”（a_004_285d）即從杜甫《徐步》的“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全唐詩》，卷 226，頁 2441）而來，展現體物細微的詩家工夫與況味。李穡有二首以《讀杜詩》爲題的作品，其一爲：

錦里先生豈是貧，桑麻杜曲又回春。鈎簾丸藥身無病，
畫紙敲針意更真。偶值亂離增節義，肯因衰老損精神。古
今絕唱誰能繼，賸馥殘膏丐後人。(a_004_062b)

李穡並不從杜甫在仕途上的困頓作論斷，而從二個層面推崇杜甫：一是歸田生活的“回春”^[23]，舉《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的“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全唐詩》，卷 221，頁 2332)，《江村》的“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鈎鈎”(《全唐詩》，卷 226，頁 2433)二詩爲例，映現出家庭生活與自然物態的互動無間，也因而更能享有家人間的悠閑互動；二是始終如一的生命力，不因爲遭逢亂離或自然老去等不如意事，而有損個人的節義與精神。這二點看似尋常卻難能的特質，真切映現出杜甫的正向思考與生命力，具有難以超越的詩家正宗地位。另一首如下：

操心如孟子，紀事如馬遷。文章振厥聲，惻怛全爾天。
法服坐廊廟，禮樂趨群賢。門墻高數仞，後來徒比肩。何曾
望堂奧，矯首時茫然。(a_004_063a)

李穡所體認的杜詩特質，還在於兼具孟子操心與司馬遷紀事精神。孟子講“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是人人所固有/皆有者，尤其是帝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24]。杜詩中每多惻隱之心，如《又呈吳郎》有云：“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全唐詩》，卷 231，頁 2544)展現出對孤苦婦人的深心體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以詩書隱約、賢聖發憤，因而撰《史記》以“述往事，思來者”^[25]，王肅已指出“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26]，樹立了史家典範。相形之下，臺省諸公，又何能望杜甫之堂奧呢？因此，李穡詩中時時可見對杜詩的閱讀與學習，如“更借南隣工部集”(《即事》，a_004_064a)、“規模杜老聯”(《即事》，a_004_076d)、“苦心方學杜陵詩”(《感懷》，a_004_090c)、“更從工部丐遺芳”(《有感》，a_004_114d)、“工部一聯

時三復”(《柳開城珣送牛蒡、蔥、蘿蔔并沈菜醬》, a_004_128a)、
 “口詠一雲工部句”(《雨中有作》, a_004_098c)、“欲學杜陵廊廟
 器”(《紀事》, a_004_213b)、“所欲霑芳杜工部”(《吟嘯》,
 a_004_510a)等,無論是寫詩技巧、生活細節或廊廟大器,都以杜
 甫為學習的標竿。更仔細體會杜甫心事,如《有感》的“杜甫行
 藏獨倚樓”(a_004_223d),親自體驗杜甫詩中的況味,如《風雨
 行》云:

吾師工部一語好,自斷此生休問天。煎熬中夜坐待旦,
 跂予南望心茫然。致君堯舜竟迂闊,詩書道缺紛相聒。當
 春發生時好節,豈獨有妨吾計活。(a_004_165b)

以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的一句“自斷此生休問天”(《全唐
 詩》,卷 219,頁 2260)為師,對個人的盛世不遇、盛年歸隱,已自
 了然於胸。致君堯舜、詩書有道的歷史高度與理想性,畢竟與袞
 袞諸公、比屋豪華的現實榮貴不相為謀。因此,杜甫不再為“道
 不同”的困窘而耗損自己的生命,選擇棄官遠走偏鄉,乃能深
 心感受“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自然物候,藉由“潤物細無
 聲”到“花重錦官城”(《春夜喜雨》,《全唐詩》,卷 226,頁 2439)
 映現滋長萬物的天文之美,恰與《南風》的生長之音相呼應。可
 見李穡對杜甫的接受,並非建立在唐宋杜詩學的體系上,而是回
 歸杜詩的文本閱讀,對杜甫詩的深心賞愛,如其《遣懷二首》之
 二有云“獨愛杜陵詩語好,草堂織月落風林”(a_004_035a),特
 別標舉杜甫《夜宴左氏莊》詩:

風林織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
 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全唐詩》,卷 224,頁 2395)

杜甫細膩捕捉的是夜晚的風林、織月、晨星與湛露,以及月落、逝
 水、流花的時光流轉,時時懷抱著書劍的用世心志,與功成不居

的江湖扁舟,交織成短暫而豐美的多姿生命。李穡獨愛杜詩而拈出“草堂織月落風林”,即在於映現天地一心的物理^[27]。李穡更推許杜甫為“賦物奇才”,《雨中忽有賞蓮之興,難於上馬,吟得三首》之一云:

白頭徒步拾遺公,賦物奇才奪化工。一句荷花淨如拭,
依稀疏雨淡煙中。(a_004_203c)

“荷花淨如拭”出自杜甫《渼陂行》,係杜甫在京時與岑參兄弟同遊渼陂之作,原作“菱葉荷花淨如拭”,李穡愛蓮,以記憶杜詩聊解無法出門賞蓮的遺憾。就賦物而言,自然物色乃隨著四時節候而變化,映現在物候感知上,如《前月立秋,故七月初一日稍涼甚》云:

七月初頭雨滿堂,立秋前月倍生涼。故知氣候無盈縮,
況是朝昏有短長。稽首乾坤蘇病骨,甘心魚稻補衰腸。高
尋白帝真乘興,工部文章萬丈光。(a_004_336d)

李穡跳脫悲秋的抒情性,直接從節氣的特性申說。立秋約在七月初一前後,預示著炎夏的結束、涼秋的到來。那一年,立秋在六月底,隨之而至的秋風秋雨,再加上日漸短而夜漸長的變化,暑氣消而涼意生,是一個美好的季節。這樣的節候感知,特別舉杜詩為例:“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江漢》,《全唐詩》,卷 230,頁 2523);“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暫往白帝復還東屯》,《全唐詩》,卷 229,頁 2503);“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望岳》,卷 225,頁 2415)等詩句,不同於歷來所關注的杜甫悲秋書寫,李穡爬梳出杜甫筆下的秋天,是秋高馬肥、身體將養有成的季節,也是一個農耕的收成季節,更是適合登高觀天地的季節,李穡即從此一面向肯定杜甫詩的經典性。

至於李穡推尊杜詩的另一項特質——紀事，除前引《讀杜詩》的“紀事如馬遷”，又如《送南巽亭存撫江陵次韻》所云“杞國憂天牧隱策，杜陵敘事巽亭詩”（a_003_567c），乃在於把憂生念亂的情懷，隨所見所聞而畢見於詩，他有《天河歌》云：

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杜陵老翁兩眼暗，
天地冥冥塵霧擁。當時張膽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至
今識者爲歎歎，夜夜素波橫碧虛。北門學士亦高才，語意纖
巧胡爲哉。江漢水多濯可潔，舊染風俗何曾回。高者自高
卑自卑，參三爲一知爲誰。（a_003_551b）

李穡先取杜甫《洗兵馬》的結語“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全唐詩》，卷 217，頁 2279）作爲開端，再以杜甫《釋悶》的“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全唐詩》，卷 220，頁 2326）作承接。細繹杜甫兩詩均爲戰亂而發，前者作於肅宗至德二載（757）安史之亂中收復京城後，極力闡明戰爭乃不得已而爲之，以功成身退爲當然行徑，避免幸功邀寵而形成“天下盡化爲侯王”的情形，更以“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的民間訴求，期待中興諸將發揮自制力，以不用甲兵爲上；後者作於代宗廣德元年（763）京城再度失守，詩中直言“天子亦應厭奔走”，因而有“錯料事”之語。杜甫對議題有持續關注的能力，所提見解的高度與深度自然不同凡響，李穡譽爲“當時張膽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自是知音，李穡《三月三日》云：

病中又見今年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樂事久牢落，
賴是少陵初寫真。當時豪麗宛如昨，至今可想椒房親。
（a_004_171a）

以杜甫《麗人行》首句“三月三日天氣新”入詩（《全唐詩》，卷 216，頁 2260），對杜甫摹寫椒房豪麗的京城顯貴故事，直許爲

“寫真”。杜甫善於紀事，並不限於政治關懷，即使是家人故事，如《百憂集行》的“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全唐詩》，卷 219，頁 2308），李穡也以“索飯啼門意甚真，杜陵詩句爲傳神”（《敬童索飯》，a_004_296a）相稱許，都在表彰杜甫紀事的傳神寫真。

李穡以陶杜並舉時，不免有“一點何曾恨枯槁，我今三歎杜陵詩”（《讀歸去來辭》，a_004_336c），“青蕊昔曾吟子美，白衣今欲舞淵明”（《喜晴》，a_004_354a）之感，陶淵明之天真豁達，自是難及。而杜甫推崇陶、謝，於《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中直言“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全唐詩》，卷 226，頁 2443），李穡於杜甫亦如斯，每每展現在襲用杜甫詩句上，如《赴廉廷秀東床讌》的“自笑狂夫老更饑”（a_004_273a），襲自杜甫《狂夫》的“自笑狂夫老更狂”（《全唐詩》，卷 226，頁 2432）；《題妙峰卷》的“會當絕頂舒長嘯，俯視衆山千萬重”（a_004_183d），化用杜甫《望嶽》的“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全唐詩》，卷 216，頁 2253）；《舊遊歌》的“生前子美宜銜杯”（a_004_027b），化用杜甫《醉時歌》的“生前相遇且銜杯”（《全唐詩》，卷 216，頁 2257）。李穡更時時以杜甫自擬，如《乞茅將蓋屋，發書之際，吟成一首》即以“子美秋風破屋歌，牧翁今日更吟哦”（a_004_397a）自況，《紀事》之三以“工部桑麻斷此生，我今田舍傍灘聲”（a_004_170d）自況，其餘如“少陵芋栗豈全貧”（《即事》，a_004_080b）、“家貧只恨無樽酒”（《洪守謙尚書見訪》，a_004_181b）、“記我囊空無一錢”（《從東亭求梨》，a_004_259c）、“愁看工部鏡”（《即事》，a_004_101d）等，屢屢自言貧如杜甫。其《自詠·先生家貧，晨炊或不繼，況於厭梁肉，既不用一錢相覓酤酒，誰復比數如此人哉》云：

顏公食粥謝乾坤，甲第紛紛日欲昏。明月清風應潤屋，
秋花錦石獨關門。（a_004_102b）

全詩自言貧，詩題自注與第二句詩化用自杜甫《醉時歌》的“甲第紛紛厭梁肉”，“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全唐詩》，卷 216，頁 2257），後二句則轉出清風明月、錦石秋花的自然美景，映現出以德潤身、以清景潤屋的境地。此外，更以記憶杜詩建立評詩的標準，如《崖頭驛·序》云：“有醴泉權政丞詩，其一聯云：‘野闊民居樹，天低馬入雲。’其形容遼野，無復遺恨。稽曰：此是遼野十字傳神，與工部‘地偏江動蜀，天闊樹浮秦’，語意絕相類。”可見李樞熟讀杜詩，故能隨時以杜詩為寫詩、評詩指標。

（二）風月無涯的落落餘師

李樞的唐詩接受雖以杜甫為正宗，並不以杜甫為限，另有李杜、李杜韓柳等多種並舉組合，而白居易、元稹、孟郊、李賀等亦各自特出，顯見李樞的唐詩接受集中在盛中唐之際，且聚焦在幾位大家身上。其《復用圓齋詩韻，聊以述懷》之三云：“今人盡說學唐詩，妙處誰曾更苦思。風月無涯天地闊，歸求落落有餘師。”（a_004_137c）以“風月無涯天地闊”形容唐詩妙處，因而強調要善求落落多師^[28]。李白（701—762）《山人勸酒》即以“落落”形容商山四皓，詩云：“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全唐詩》，卷 163，頁 1690）以雲松、春風、蝴蝶與芳草的無盡風景，映襯出四皓的落落襟懷。是以李樞雖以杜甫為唐詩正宗，亦能如杜甫之賞愛李白詩歌造詣，因而有時以李杜為詩歌的兩大典範，《用前韻（即奉懷恩門益齋先生）自詠》即以“森嚴武庫連工部，浩蕩詞源倒翰林”（a_004_037d），以無所不有的杜預形容杜甫的沈鬱頓挫，以空所依傍形容李白詩的雄奇飄逸。在《述古》更合李、杜而言“調高李杜奇仍法”（a_004_052d），又如《次金同年前後所寄詩韻》云：“風騷蕩盡寂無聲，沈宋浮華鮑謝清。今古詩家誰健步，且教李杜獨齊名。”（a_004_004d）李樞縱觀古今詩歌發展史，以為風騷之後，沈、宋、鮑、謝各得一偏，而真正能卓然成家者，則屬齊名的李白與杜

甫。李杜均曾積極以求仕進，最終則以詩人自許、以詩名家，在事功之外成就了詩歌的兩大典範。李穡亦曾有過詩文與功業的取捨，如《即事》三首之二云：“狂追李杜文章妙，妄擬蕭曹功業豐。”(a_004_399d)最後確立了以李杜文章取代蕭曹相業的抉擇。故《偶題》云：

李杜文章繼者稀，鳳凰何日更雙飛。功名滿世今難致，
道德離倫古亦希。陶寫性情堪自養，敷陳政化有誰非。病
餘咀嚼詩中味，遇興時時筆一揮。(a_004_078a)

以李杜並世的鳳凰雙飛為詩學高峰，尤其在功名滿世、道德離倫的時代氛圍下，特別標舉杜甫《遣悶十二首》的“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全唐詩》，卷 230，頁 2518)。闡明詩可以陶寫個人性情，並藉杜甫《石筍行》的昔時卿相墓，感歎“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而願得壯士將擅虛名的石筍擲天外(《全唐詩》，卷 219，頁 2303)，也說明李穡宗杜多言賦物而少紀事的緣由。相對於杜甫的賦物與紀事，李穡對李白的接受，著重在“謫仙”的俊逸不群與奇姿異彩，且視杜甫為李白知音，如《即事》之二所云“天挺人豪李翰林，當時工部是知音”(a_004_007d)，故多藉由杜甫詩句來呈現對李白的接受。除了《中秋已近，興懷發詠》直言“謫仙才逸鳴唐李”(a_004_237c)，《詠太白》盛贊李白文彩云“謫仙風彩照堪輿，醉賦沈香興有餘”，“艷詞吐鳳紆新寵，豪氣騎鯨入大虛”(a_004_132a)。李白把光照天地的風彩，映現在詩歌創作上，特別拈出醉賦《清平調三首》作為指標，說明李白在帝王面前依然能夠縱放恣肆、揮灑自如，借用杜甫《飲中八仙歌》的“天子呼來不上船”(《全唐詩》，卷 216，頁 2260)及《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的“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騎鯨魚”(《全唐詩》，卷 216，頁 2259)，以李白瀟灑騎鯨入海的姿態，抗衡朝廷帝王權勢的宰制，方能有如《清平調三首》、《宮中行樂

詞》等深獲帝王青睞的詩歌作品，結語“莫道婦人并酒耳，知仁觀過一欷歔”，為宋人批評李白“十首九說婦人與酒”^[29]提出辯護，更一再表達歎惋之意，其《讀李白詩》云：

豪氣凌雲不得口，滿天光焰吐文章。欲尋影響竟無處，
極目大清空斷腸。(a_004_509c)

仍著眼在李白的凌雲豪氣與絕世文章，同時呼應杜甫《春日憶李白》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全唐詩》，卷 224，頁 2395），以及《不見》的“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全唐詩》，卷 227，頁 2459），兼具極力贊揚與深致歎惋之意。故其《自詠》云：

詩興狂無敵，時時逼謫仙。昂藏如野鶴，孤潔比秋蟬。
露冷千林月，雲飛萬里天。悠然淡無累，何日是歸年。
(a_004_240d)

李穡以自己的詩興之狂可與李白相比擬，緊接著自陳有如野鶴、秋蟬、冷月、雲天，孤潔不群、悠然無累的個性特質，迥異於李白的豪氣凌雲、飛揚拔扈。因此，李穡對李白的接受，不同於對杜甫的論述分明，而是著重在若干詩句的賞愛，如《又作捲浮萍見水底花影》云：“日照紅妝水底明，翰林詩句使人驚。浮萍捲盡天光淨，不費丹青自寫生。”(a_004_215d)首句直引李白《采蓮曲》，原詩作“日照新妝水底明”^[30]，喻為天然化工，非人工所能描摹。李穡另有詩題《是日命僮僕入池捲去浮萍，花影倒垂，上下一色，甚可愛也。因思太白“日照紅妝水底明”之句，即欲足成一首，竟未能而罷。數日骨酸，雖或吟哦，不得沈思，略寫一時情景，以為後日追述之地。衰病如此，可不悲哉》(a_004_215d)，仍是記憶李白捕捉自然光影的詠荷佳句。又有《朴淵布瀑歌，熱甚故歌之，所以接水聲於耳目焉耳》以李白詩自許，云“臨流狂興自發越，直如太白歌短歌”(a_004_219d)，是以李穡

對李白的接受,多以摘句襲用,如《夏日即事》的“歷井捫參蜀道難”(a_004_199d),《前數日登天水寺西峰愛其勝概……於是有感焉,乃作吹笛峰一篇》的“古人今人若流水”(a_004_219a)等,亦如前引杜詩“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之意。

李穡對唐詩的接受,係由李杜擴展到中唐詩人群,以《夜坐有感七首》(a_003_531a)為例,首揭“忽得唐詩參李杜”,第二首的“卧看滄海風濤壯,擬掛雲帆萬丈高”,化用李白《行路難三首》的“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全唐詩》,卷162,頁1684);第四首的“世間萬事真棋局,妙手無如不著高”,化用杜甫《秋興八首》的“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全唐詩》,卷230,頁2510);第五首的“欲試昌黎陟降勞”,取韓愈登華山絕峰故事^[31],得出“上了最尖還大笑,不如平地望高高”;最後一首歸結於“夜來小雨風吹去,更喜春畦芽漸高”,則又是杜甫歸田境界。是以《書樵隱銘後》之六所云乃“平生眼前無一人,李杜韓柳為比隣”(a_004_149c),以李、杜、韓、柳並舉。《有感》也指出:“萬物蒙光自焜煌,璧奎河漢耀文章。班香宋艷花藏霧,島瘦郊清月照霜。總道元和傳絕域,須知大歷(曆)坐明堂。昌黎夫子尤豪甚,直播長風卷大洋。”(a_004_076c)不同於文學史所載元和時期白居易詩盛行於雞林,李穡認為三韓對唐詩的接受,仍應以杜甫為代表的大曆詩人高居明堂王位,而元和詩人中又特別標舉孟郊的“清”、賈島的“瘦”,更以韓愈的“豪”為最,相形之下,元和詩派遂居下風。

李穡對韓愈的接受,主要在創作精神與事功。創作方面,韓愈與杜甫同屬具開拓性的詩人,擴大詩的範疇與功能,因而並列成為李穡景仰的典範,《有感》云:“古人不可作,千載揖清芬。工部詩為史,昌黎韻亦文。天才何卓卓,物議亦紛紛。誰識韓山子,羹墻對放勳。”(a_004_402d)詩主言志、抒情,文長於敘事、議論,杜甫以詩為史,已見前文,韓愈學杜而使詩具有文的功能,杜韓在擴大詩歌範疇與境界上都具有突破性的開創,引起的爭

議也不少，韓愈已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全唐詩》，卷 340，頁 3815），力抗俗情物議，而李穡更以敬仰堯的典故，極力推尊杜韓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前引李穡《天河歌》已譽杜甫“當時張膽吐此句，白日赫然明宇宙”，李穡對韓愈的接受亦著重在韓愈的膽識勇氣，《題朴總郎詩卷十九首》云：“八代文章弊，昌黎仰泰山。去陳仍體古，養浩覺神閑。且莫忘三上，須教塞兩間。銅龍方逞巧，醇朴幾時還。”（a_004_117c）乃合詩文而言，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建立在對堆垛陳言的批判，直接學習經典的青華，善養浩然之氣而遊刃自足，尤其是未遇前的三上宰相書中，第三封《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的直言無忌，以周公求賢若渴的精神，質問時宰的作為，憂憤之情溢於言表，並據以針砭當時專求文字精巧的寫作風氣，期以回歸醇樸古風。《小心行》特別標舉韓愈《琴操》十首為例，云：

明窗靜几無塵埃，獨歌《清廟》賡《靈臺》。青天白日亘萬古，一毫纖翳無從來。昌黎《琴操》不可繼，泰山表海何崔嵬。（節 a_004_155b）

李穡標舉《詩》的《周頌·清廟》與《大雅·靈臺》，乃藉由頌美文王來映現與民同樂的氣象，有如亘古如斯的青天白日，始終清明不染。接著拈出韓愈貶潮州時所作古題樂府《琴操》十首，直探文王、周、孔之心，雖處幽窮仍守正樂道以自持，嚴羽即指出：“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32] 李穡亦有“不可繼”之歎。事功方面，主要展現在韓愈所參與的平淮西乙役，一再以謝安相比，如“欲上崢嶸平賊後，昌黎還有謝安風”（《退之從容軍馬間，其風不下謝安石，作一絕以詠》，a_004_204c），“韓子古文唐北斗，謝公雅量晉東山”，成為李穡“慨然興想輒忘食”（《自詠四首》之四，a_004_041a）的典範。韓愈《元和聖德詩》寫憲宗元和元年（806）平定藩鎮事，除了如《詩序》所

言“依古作四言”、“指事實錄”，歷叙“收夏蜀，東定青齊積年之叛”，尤以摹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征討劍南劉闢事，以濃彩重墨摹寫強藩伏誅，不避血腥，而歸結於“皇帝神聖”、“仁濟施厚”、“并包畜養”，更以“作為歌詩，以配吉甫”作結（《全唐詩》，卷 336，頁 3760），呼應《詩序》所稱“作歌詩以稱道盛德”，可謂深心善禱，是以李穡《自詠》乃有“只緣尚有丹心在，欲繼元和聖德詩”（a_004_230c）之志。因而對韓愈奉旨撰《平淮西碑》遭爭名者毀碑一事，作《偶題》詩云：

昌黎再拜謝文昌，刮去淮碑實不妨。摹寫典謨如捕影，
終輸貝錦有文章。心生好惡名難掩，眼有高低物豈傷。海
上牧童千載下，仰瞻雲漢揖餘光。（a_004_428d）

韓愈《平淮西碑》同樣是歸美君王的臨事睿智與待民仁厚，以及裴度的善體君心、領導有方^[33]，而李愬部將乃毀壞石碑，憲宗亦聽信讒言而下令磨去碑文，另由段文昌撰文，即李穡所言“摹寫典謨如捕影，終輸貝錦有文章”，而以瞻仰餘光表達對韓愈的敬意與肯定。其《後儒仙歌，歌拙翁次韻》有云：“草檄傑語鳴於唐，昌黎崛奇籍湜僵。騎龍一去今千霜，雲孫繼踵出東方。”（a_004_004a）以崔致遠（857—951）《討巢賊檄》^[34]為喻，再以張籍、皇甫湜的制式化襯托出韓愈在創作上的奇崛，甚至以為韓愈的傳人就在三韓。惟李穡與韓愈的生活情調明顯異趣，如《遣興》云：“肯向昌黎學送窮，祇今天爵冠儒宮。蛙鳴芳草絲絲雨，燕蹴飛花細細風。寂寞沈吟多骯髒，紛紜割據幾英雄。勞身焦思皆黃壤，且與八仙游飲中。”（a_004_013d）韓愈《送窮文》為抒發抑鬱憤慨之作，雖有《盆池五首》的“一夜青蛙鳴到曉”（《全唐詩》，卷 343，頁 3847），《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全唐詩》，卷 344，頁 3864）等體悟，畢竟是偶得。因此，李穡以“蛙鳴芳草絲絲雨，燕蹴飛花細細風”二句，展現樂於詩酒與自然醇樸的生活，猶如杜

甫處處可見物理，因而與《飲中八仙歌》更爲親近。

李穡對韓派其他詩人的接受，主要是從澀難與苦吟著墨，如《即事》之二的“共推樊澀難多作，又得郊寒可一吟”(a_004_007d)，此即韓愈《荆潭唱和詩序》所稱“愁思之聲要妙”、“窮苦之言易好”^[35]，又稱孟郊詩：“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冓。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全唐詩》，卷337，頁3781)稱樊宗師不肯蹈襲前人一言^[36]，李穡也在《復用圓齋詩韻，聊以述懷》闡述刻骨推敲之必要：“刻骨酸寒是野詩，須知偶得雜深思。敲推馬上真如畫，淨洒天街有兩師。”(a_004_137c)刻骨深思中的偶得，最能洞見古今、深契萬象，如孟郊《慈母吟》由春暉寸草映現母慈長養之恩，至今膾炙人口。復以韓愈推敲之作《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細膩感知京城早春的氣象與景物，以文字摹寫而具有繪畫的效果。李穡更以詩人李賀(790—816)巧奪化工，《讀高軒過》云：“總角荷衣七歲童，聯鑣束鬢得韓公。錦囊拾盡人間巧，二十餘年竊化工。”“心肝吐血短長歌，怪怪看來巧更多。一曲金仙辭漢去，渭城迢遞月如波。”(a_004_062d)依王定保《唐摭言》記載，李賀七歲得韓愈、皇甫湜聯鑣造訪，作《高軒過》，一生嘔心瀝血，極力雕搜，設色穠妙，瑰詭奇麗，特別舉《金銅仙人辭漢歌》爲例，稱其爲巧奪天工的能手。相較於韓愈詩人群的苦吟雕搜、奇崛高絕，李穡對於“元輕白俗”則略有保留，《寄圓齋》提出“莫笑元輕并白俗，苦嫌艱澀似宗師”(a_004_136b)的見解，元、白的輕俗看似猶勝樊宗師的艱澀，惟《自詠》乃云：“沈思自然格律嚴，元輕白俗非所酣。雲煙變化可自瞻，天地高深如手探。”(a_004_288a)強調詩有其“沈思自然”的蘊涵，包括目可視的雲煙變化，思可至的天地高深，都需要藉由人爲的格律技巧以臻化工，因而對“元輕白俗”持保留的態度。

晚唐詩人中，李穡對於推許李、杜、韓、柳的杜牧(803—852?)有比較高的接受度^[37]，其《感舊》云：“青衫濕盡思居易，

紅粉回餘憶牧之。已喜消磨無一點，始知求處有餘師。”(a_004_050a)乃屬於年少時期的階段性接受。又有《即事》云：“少年詩句學樊川，襟袖好風吹颯然。老境身閒心自快，長篇氣弱語難全。晴雲弄日明還晦，芳草和煙斷復連。未必羸才似工部，倒冠落佩有誰憐。”(a_004_187c)首句直言少年詩句學杜牧，並舉杜牧《秋思》的“微雨池塘見，好風襟袖知”(《全唐詩》，卷523，頁5985)為例，體物細微，風格清麗。相對於年少的風流，老境自有其身閒氣弱、心快語難全的長短處，也更能體會自然物候與景致的變化。李穡雖不認同杜牧為繼杜甫之後的“小杜”，對杜牧《晚晴賦》所自稱“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疏”的晚境^[38]，則有著深切的同情。另一首《即事》的“滿庭煙雨情無極，更擬樊川賦晚晴”(a_004_180c)，同樣表達對杜牧的心許。又於《讀樊川集題其後》云：“綠葉成陰子滿枝，湖洲水戲負前期。非關杜牧尋春晚，自是周墀拜相遲。一篋恩深平善日，三行顏破發狂時。卻從餘暇論時事，今古羸才更有誰。”(a_004_053d)首聯出自杜牧刺湖州所作《悵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全唐詩》，卷527，頁6033)感歎十四年前佐宣城幕遊湖州事，卻為“尋春晚”翻案，杜牧連上三啓請求外放湖州刺史，至周墀(796—855)於宣宗大中二年(848)以直言拜相後，方得於大中四年(850)到任湖州刺史。結語更以杜牧好言時事，發揚蹈勵而少餘蘊^[39]，為杜牧的落拓江湖作一注脚。可見李穡對唐詩的接受，大抵有其自主性的空間，如《次圓齋韻》所自言：“吾詩豈似志和詩，遇興吟來不復思。獨愛斜風并細雨，綠蓑青箬欲相師。”(a_004_138c)李穡自認與張志和(730—810?)在詩歌創作上的差異，卻能賞愛張志和《漁父歌》的“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全唐詩》，卷308，頁3491)，成為一詩之師，可見一斑。李穡對唐詩是一種批判性的接受，《讀舊作》云：

天教牧隱管長吟，頗覺年來興趣深。意舊語新詩格律，
坐多行少病光陰。韓奇樊澀皆殊體，島瘦郊寒只苦心。直
欲遡流探雅頌，自憐衰老力難任。(a_004_059c)

長期對詩歌創作的興趣，使他領略到韓愈詩人群在格律上講究“意舊語新”，從而發展出韓奇樊澀、島瘦郊寒的不同用心與風格，卻也失去了自然曉暢的風雅言志傳統。因此，李穡一則於《晝坐二首》感慨“盛唐何渺渺，詩道近來衰”(a_004_304a)，有《真觀大選來問唐詩語義》，再則自謂“老境詩篇雜古今”、“文章體製殊非古”(《冬至》，a_004_091b)，無論是盛唐已邈或老境隨心，李穡對唐詩有所承，如《守歲，用唐詩韻三首》(a_004_132b)即是用李德裕《嶺外守歲》的回、催韻(《全唐詩》卷475，頁5416)，寫逝水流年的感傷，而擅長性理之學的李穡，於閱讀唐詩後，亦以自家體會作出回應，如《讀唐詩畏老身全老之句，予則幸之又幸，故衍爲三首》(a_004_136c)，出自李益《惜春傷同幕故人孟郎中兼呈去年看花友》“畏老身全老，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全唐詩》，卷283，頁3221)。乃一再吟詠“古人稱畏老，今我喜之深”，“所畏老之至，今吾喜也深”，並以“道路如連袂”、“箇中無壽夭”的隨緣與體道，消解故交零落的老情。《讀唐賢詠月章》(a_004_077b)乃就駱賓王《玩初月》的“忌滿光先缺”(《全唐詩》，卷79，頁863)，生發出白頭未歸的遺憾；《讀唐賢花詩》(a_004_150c)則對王維《紅牡丹》的“綠豔閒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全唐詩》，卷128，頁1304)合花心與春色而爲一，體會出造物無語而化成的深意。至於《夜聞簷溜，曉起錄之》的“雪消簷溜終雪溜，卻似巴山夜雨詩”，“如今獨立亡羊處，笑殺胡曾數首詩”(a_004_088c)，前者化用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後者有意跳脫胡曾詠史詩的褒貶。整體而言，李穡對唐詩的閱讀可謂廣泛且具持續性，其中體會最深微處，當是體現由杜甫“賦物”而來的自然物

候感知,因而對於各有所長的落落餘師,也同樣聚焦在體物細微的物候與景致變化上,並由此開展出與天相親的詩歌創作旨趣。

三、由潤物發榮到順性得時的物候感知

李穡的學詩、寫詩,旨在發揚具有三韓特質的東方之文^[40],如《立春帖字》所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巷無私白日長。欲識此詩真氣像,請看今世我東方。(右城中)”“青山有約長當戶,流水無情自入池。欲識牧翁吟嘯處,春風浩蕩動新詩。(右別墅)”(a_004_502d)以人與自然的相互映照,形構出詩的氣象,並以此氣象為東方之文的映現,從而開拓出無限寬廣的詩思。其中尤以有道青春、無私白日、當戶青山、入池流水、浩蕩春風等春天的質素最為鮮明,衡諸《景春說》所云“仁之發而春之暢也,民之從化,如立春風,和氣四達,流乎無窮”(a_005_087d),以仁與春天對應,透顯出春天的化洽和暢與生意盎然。因此,李穡詩集中最引人注意者,當屬與天相親之作,其中頗見與中原連結的記憶,多藉中原古籍以開拓自家襟懷,如《陽村記》即以順天時為聖人之教的根本法則,云:

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蓋仲尼,猶天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照,物乎其間者,形形色色,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尚何幽隱之有哉。……浴沂風詠之流,猶足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雨化之者,發榮滋長,復何言哉。(a_005_020a)

李穡以自然現象作為詮釋聖人之言的逕路:其一,以天地日月形容孔子的無所不包、無所不照,因而能廣泛照應到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其二,以《詩·大雅·旱麓》的“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為喻,說明天地萬物各順其性、各得其所;其三,以《論語·先進第

十一》在暮春時節的“浴乎沂，風乎舞雩”，作為唐虞氣象的表徵；其四，以《論語·陽貨第十七》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呈顯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自然物象。可見李穡力主回歸自然法則的人文見解，其《風詠亭記》亦云：“順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歸，胸次悠然，無一點綴……使伏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a_005_005c)明確提出“風乎舞雩”作為“順天時”的指標，無論是平居生活或仕宦為政，可映現出個人的“胸次悠然”與“和氣洋溢”之志。

李穡又熟悉曆書所對應的節候，如《清明節》的“風日清明應曆書，宣流和氣謝堪輿”(a_004_176b)，也能注意到氣候異常現象，如丁憂返家後作《清明雪，次伯父韻三首》之一云：“凍燕飛來不耐風，雪華吹冷草堂空。裁成白紵還羞澀，誤認清明歲歲同。”(a_003_530d)面對三月的一場清明雪，李穡以候鳥已北返、人更換了春服，說明“清明歲歲同”的經驗法則是不可恃的，可見李穡屬於對物候感知較為敏銳的詩人。此外，中原學仕的經歷，也使他注意到地域性的氣候差異，如《梨花下又賦》云：“中原寒食日，爛熳欲蒸雲。東國春多冷，群花晚吐芬。鷺鷥飛可比，蛺蝶舞難分。幸此落尚少，繞行忘夕曛。”(a_004_279c)說明中原地區的寒食，已是繁花盛開、爛熳如雲，而三韓的春天來得晚，連帶著花期也比中原晚。又如《鞦韆》之一云：“中原寒食好東風，人與鞦韆在半空。須記三韓端午日，紵衫輕舉語聲中。”(a_004_055c)唐代上巳、寒食、清明正是繁春盛景，由京城到邊鄙均盛行鞦韆之戲^[41]，而三韓地處東北，三面環海，冬季漫長寒冷，要到端午纔盛行鞦韆，可見兩地氣候大約差了兩個月。由此可見李穡詩中所體現的物候感知，乃以記憶的中原春天為主軸，從而開展出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的自在清明，分述如下。

(一) 潤物發榮的自然物象

李穡推許杜甫為“賦物奇才奪化工”，更深心體驗杜甫在物候上的感知，寫出“故知氣候無盈縮”、“當春發生時好節”、“花蕊蜂鬚風細細，芹泥燕嘴日遲遲”、“明月清風應潤屋”等學杜詩句，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長的物理，最為深微而親切。詩中更上溯《詩三百》，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如《感春》云：“桃李無言惱殺人，惜春何故欲留春。流連光景是吾戒，努力事天如事親。”(a_004_282c) 桃李盛開點綴出繽紛春景，自《詩三百》中即與人們生活與生命繁衍緊密相連，而後卻在詩歌發展中成了習見的思春、惜春、憐春、留春等“傷春”主題，李穡乃引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所云：“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42]說明聖人之教的失落，遂使自然物色淪為留連光景的載體，因而藉杜甫墓係銘提出“事天如事親”的主張。其《即事》乃以“晝茅乘屋午天陰”開端，以“明明上帝似親臨”作結(a_004_284a)，取《詩·豳風·七月》的“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之意^[43]，映現人只要順時作為，即可共沐天地化育萬物的生意。

李穡善於寫雨，尤重雨的潤物對農耕的作用，如《喜雨》所云：“一雨濛濛暗水涯，勃興禾稼見朝來。蒼天豈有忘民日，已分千倉玉粒堆。”(a_004_064c) 濛濛時雨之後，陶淵明《停雲》看到的是“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翩翩飛鳥，息我庭柯”^[44]，而李穡則是關注到禾稼勃興的生意，並且預見了“千倉玉粒堆”的物阜民豐景象。又如《紀事二首》的“細雨如膏兆有年，田間好語遞相傳”(a_004_100b)，如膏細雨與田間好語交織成最美的田園風光。再舉以《雨》為題的二首詩為例：

一春知幾雨，岸幘從衣濕。自喜農有事，時哉要須及。
花間新水生，柳外殘虹立。忽得晚晴詩，茅簷暝痕集。
(a_004_010d)

細雨自入土，可慰南畝氓。屬茲仲夏望，油然樂自生。
莖葉日益大，已足觀秋成。鼓腹退田野，從茲歌大平。
(a_004_316a)

前者為春雨，農民把握住幾場春雨，依時耕種，農作物自然欣欣向榮，而水潤花開柳綠，雨過的彩虹更點綴出一片自然風光，交織成醇美的鄉居生活，處處充滿詩意。後者由春入夏，細雨滋潤了大地，農作物涵養得莖葉肥美、綠意盎然，秋收可期，民生自足，如《莊子·馬蹄》所云“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45]，上古醇樸生活與天下太平原是如此容易。而天地無私，雨潤萬物，除了農作物獲得滋長，害穀的稂莠同樣長得青翠，農民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良莠，如《偶書》所云：“種下田疇稂莠生，風吹雨潤共青青。分明有箇農家眼，天道由來祇窈冥。”(a_003_546c)在雨潤萬物的春夏兩季，農民的工作就只在去除稂莠，加上由夏至秋的充足日照，接著即是秋收的歡喜，如《秋日即事》所云：“初秋氣乍涼，餘熱勢難敵。畝金煉以純，洪爐造化力。膚汗滴如珠，農家喜無極。”(節，a_004_020c)把莊稼收成之功歸於天地造化，“故鄉魚稻自風流”(《聞蟬，是日立秋》，a_004_215c)，即可擁有自足的生活。惟李穡雖然嚮往《詩豳風》所映現的醇樸業耕生活，也能樂在退隱，畢竟沒有放棄士人/詩人身份，如《同年任希座以匏見惠》所云：

豳風斷壺我少讀，民事由來致其曲。同年先生慕周初，
服田南畝桑柘綠。秋來籬落掛新匏，小如杯棬大如櫛。知
我家貧懶學圃，年年持來照窮谷。(a_004_198d)

李穡不諱言對《豳風·七月》的嚮往只停留在閱讀記憶，由於“懶學圃”而缺乏“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的體驗^[46]，與實際歸田

的同年任希座相較，自然是文人興味多些。即使如此，入仕時期“雨”仍是與故鄉耕稼的連結，《雨中》云：“出直銀臺信馬回，幽居獨坐絕人來。雨深病葉時時落，春去餘花續續開……南方旱甚方行禱，天意蒼茫信大哉。”(a_004_003a)那一年的春天，京城的春雨特別足，影響到植栽的成長，甚至延緩了花開的時序，夏日對花讀書固然適意，李穡卻掛念起南方缺雨的損害稼穡。又如《入直省中，聞雨次韻》云：“帷薄涼如水，階空滴到明。種瓜幽興動，小圃在江城。”(節, a_003_543c)京城一夜聽雨，心中浮現的是江城小圃種瓜的景象。甚至聽到雨聲，都彷彿是家中槽床滴酒的聲音，如《曉雨》云：“曉來風雨灑微寒，簷溜聲中客夢殘。似聽吾家春酒熟，槽床一夜滴金盤。”(a_003_547c)因此，李穡對雨的記憶，盡是潤澤萬物、發榮滋長的氣象，如“草綠江南多好雨”(《即事》，a_004_054d)，“一雨洽塵寰”(《偶題》，a_004_055b)，“天晴嫩綠遍園林，衆鳥飛鳴送好音”(《天晴》，a_004_287a)等是，其《雨中》之一更寫出：

雨聲颯颯滿虛堂，午夢初回索筆忙。心淨自無私意起，
一涼恩厚謝蒼蒼。(a_004_057b)

在午寐中被雨聲喚醒，不同於一般夢斷眠未足的懊惱，李穡不從個人的感受著墨，反而對雨的消除乾旱炎熱滿懷感恩，自無絲毫不快意。是以李穡書寫雨中雨後的自然物象，不論是勞力所得的農產豐美，或是賞心所見的花木扶疏，處處充滿體悟人間好風光的愉悅，如《雨後二首》的“鵝黃映日柳垂庭，小雨朝來又送青”，“小桃枝上綻微紅，雨過啼禽又喚風”，細膩摹寫早春的柳樹因著春雨而由鵝黃轉為青翠，接著又是桃花新綻、園禽乍啼，李穡已是“屈指未旬應爛熳”(a_004_096a)，想像著春雨潤澤後的繁花盛景。是以《雨後即事》乃云：“夜來飛雨洒闌干，春夢初殘曉色寒。開戶不知身在處，滿城桃李錦成團。”(a_004_097b)一夜的春雨，改變了滿城的物色，桃李花已綻放成一片錦繡。這

一幕景象，遂與杜甫作了連結，《微雨》云：

微雨庭中暗，輕煙屋上浮。年光近寒食，春澤似酥油。
玩物閑尤甚，吟詩老不休。錦官紅濕處，髣髴想風流。
(a_004_447d)

寒食前的綿綿春雨，幾日陰霾之後的欣欣草木，閑中玩物，想像杜甫《春夜喜雨》的“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全唐詩》，卷226，頁2439），別是一番心境。又如《雨》的“小雨濛濛止又來，群花爛熳錦成堆”，“春色滿天收不盡”，仍歸結於“曉看紅濕思工部，賸馥遺芳徧八垓”（a_004_452d），雨後的滿天春色、繁花成錦，是李穡年年記憶杜甫的最佳載體。而如此繁花盛景，更使李穡不斷開拓眼界，《上南山賞花》云：“走上南山頂上看，春風浩蕩曉猶寒。天如翠幕花如錦，一介書生眼界寬。”（a_004_097c）冬去春來，山上的早晨猶存寒意，而放眼所見盡是花團錦簇，李穡深切體認到春雨潤物、大化流行的自然法則，也就無需為傷春、惜春而留春了。《春陰》三首之一云：“春陰漠漠午風輕，綠暗紅殘小院明。微雨乍來看不見，忽聞黃鳥兩三聲。”（a_004_456b）春花在春雨中綻放，同樣也在春雨中殞落，此時的黃鳥聲，恰恰映現了春去夏來的節候變化。李穡特別藉雨來細膩捕捉春夏交接的光景，《曉雨》之一云：

三月三十日，雨聲如別春。溟濛連碧樹，點滴浥紅塵。
殘花猶萬片，嘉種已千囷。牧隱操觚處，東風似駐輪。（a_004_098d）

最後一天的春雨，依然沒有停止潤物與滌塵的任務，樹已綠，殘花猶存，可以預期今年將是個豐收年，詩人乃能放懷飲酒，坐擁一季好春，更以詩筆留下殘花與嘉種並陳的春景。緊接著夏日的到來，如《又賦》的“胡蝶落花春已暮，鶉鳩深樹雨初晴”，“四月清和明日是，更從墻下賞葵傾”（a_004_099a），《即事》說“落

花飄雨春光盡，深樹生煙夏景鮮”(a_004_099c)，李穡並沒有沉浸在花落蝶逝春光盡的感傷中，而極力捕捉春雨潤澤後的深樹衆鳥，映現出首夏清和的鮮明景象。有二首《即事》詩云：“四月清和亦快哉，黃鸝語滑暑風來。最憐牆下葵花在，又是今年向日開。”(a_004_293d)“流鶯啼處綠林深，夏景鮮明快我心。芳草和煙靄平野，好風吹雨弄輕陰。”(a_004_186c)四月節氣正清和，除了黃鸝聲軟，還有不屬於春花的黃色向日葵，妝點出特有的孟夏風情。繼續隨著時光流轉，滿眼盎然的綠意招邀了更多的鳥類，李穡循著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的詩情，徜徉在芳草平野的夏景中，如《夏日即事》云：

溽暑經過少，靜居長短吟。偶然觀物化，亦復明我心。
蟻陣跳白雨，鶯梭懸綠陰。吾廬信可愛，即是晉陶潛。(a_003_566d)

潮濕悶熱的盛夏，降低了人的活動力，李穡仍能藉由“觀物化”敞開心懷，從而使蟻陣、鶯梭、白雨、綠陰都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同順其性、同遂其生、同樂其境，也就同於陶淵明《讀山海經》的“吾亦愛吾廬”了^[47]。以此心境，夏去秋來，依然是良辰美景，《雨後紅樹可愛，次韻賦之》云：“雨過秋山葉落多，最憐錦上更添華。至今膾炙楓林句，始驗紅於二月花。”(a_003_563a)唐人固多悲秋之作，李穡乃取杜牧《山行》所云：“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全唐詩》，卷524，頁5999)面對秋雨過後的滿山落葉，以鮮妍紅艷點綴得秋色似錦，反而更添了憐愛之心。《雨過》亦云：“雨過長空敞碧羅，行雲濃淡尚嵯峨。秋容新沐山如畫，細履樊川放短歌。”(a_004_059c)秋雨過後，殘餘的雲也被秋風捲向遠天，長空是一塵不染的藍，而雨洗後的秋色山容，更顯得風景如畫，也就更貼近杜牧“坐愛楓林晚”的詩境。李穡詩中的一年三季，都在雨中顯現不同的風情，如《新春遣興》的“萬物逐時變，情與光

景流”(a_003_565a),《紀行》的“風吹小雨半空秋”(a_004_099b),自然極少悲秋之作,也都可見李穡“觀物化”的體悟。李穡用“雨”連綴充滿生機的春夏秋,面對冬季的到來,有《晦日聞雨》摹寫秋天的最後一場雨:

白藏欲去玄冥來,夜半禪代何巖哉。雲旗霧帳中天臺,
雨師亦復清塵埃,天公爲之一笑開。群神授職各有司,不曠
不侵生物孳。我今作詩嘲雨師,滕六將至君何爲。(a_003_563b)

詩爲七古,句句用韻,前五句以擬人的筆法,把秋天的最後一夜寫得極其慎重,雨師仍然盡職地扮演清塵的角色,並以天公的志得意滿,帶出諸神的各有職守,同時由灰韻轉爲之韻,以諸神各自遵循職守在於確保“生物孳”,因而對於冬季雪至後的凍殺萬物,李穡乃以嘲諷的口吻質問雨師的無所作爲。因此,對於傷禾害稼的非時/過量之雨,李穡除了寫出“大雨既傷稼,民生誠可哀。滂沱又不止,咎徵安在哉”(《八月初一日雨》,a_004_059b)的呼籲,《秋雨歎》更提出“玉皇案前誰待筆,請記農家流日程。惰者甘心向溝壑,他人苦語神其聽”(a_004_063b)的哀告,而一放晴即作《秋雨歎成篇,天霽景明,神形爽快,又作秋陽歌》,有“年年農家得大熟,鼓腹不復愁妻孥”(a_004_063c)的欣喜,可見李穡的物候感知,潤物發榮、滋養萬民始終是關注的核心。至於《又吟》中更以時雨與秋颶作對照:“雨細久自潤,風輕微有聲。物生遂暢茂,夭夭爭發榮。垂衣拱淵默,禮義陶人情。神化自無迹,海宇煙塵清。風雨忽暴至,摧摧如甲兵。高木倒且折,奔流壞南城。嗚呼白髮叟,卧病蓬窗明。冥心每自禱,歲月今幾更。”(a_004_059b)潤物好雨的特性在細在久,而草木就在雨的潤澤中,生長暢茂、夭夭爭榮,映現出天不言而百物生焉的自然法則。由於三韓受東亞季風的影響,秋季颶風頻繁,充滿毀滅性的暴風雨,造成拔樹、毀屋、壞城的危害,留下中原詩歌少見的颶

風資料,都可見李穡詩歌在物候感知上的敏銳。

(二) 順性得時的生活樂境

李穡主張事天如事親,除了展現在農耕上的潤物發榮,在生命體悟上也有其物理,如《雜詠》云:“南山當我窗,有樹生其顛。朝昏逞媚嫵,風日涵清妍。葉間遺好音,黃鳥時方遷。念此坐長歎,物理由自然。奈何昧出處,順序當事天。”(a_004_294d)全詩由陶淵明詩意而出,由《飲酒》之五的“悠然見南山”與“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停雲》卒章的“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48],構設出景氣清和、物我同化的生存境界,而如此境界就在順序事天中,隨處映現的自然物理。其中“黃鳥”更遠溯為憫行人勞瘁而作的《詩·小雅·綿蠻》,李穡另有詩題引《大學》孔子釋《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夫子釋之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a_004_296c),即是深切感慨人類困於行役,已經失去了鳥類“知其所止”的自然物性,如《曉起》所云:“參贊神功誰得識,屈伸妙理自難求。不知黃鳥將何意,啼送綿蠻不肯休。”(a_004_316d)以綿蠻黃鳥重新喚起人們的記憶,回歸參贊天地化育的自然法則,即可盡情享有自然美景,如《晨興二首》的“百鳥喧春陽,群花敷露華。聲色自無私,天下方一家”(a_004_134b);《野花》的“野花隨處不知名,藁叟樵童眼界明。豈必上林為富貴,天公用意自均平”(a_004_317a);《看花》的“造物乘除應有意,綠陰芳草勝花時”(a_004_406c);《蟬聲》的“春花秋蟲我耳目,紛紛萬物皆生成”(a_004_466a)。造物無私,春天的遍野花開,夏天的綠陰芳草,秋天的盈耳蟲鳴,能親切品賞良辰美景,人們即可容易地棲居詩意大地^[49]。李穡更拈出孔子與弟子言志的浴沂風詠做為詩意棲居生活的典範,《自傷學之未至也,求諸日用中吟成二首,以致其力焉》云:

春風和氣中,發榮得其時。雖然曾氏魯,千載我所師。

(a_004_024d)

李穡把文字之學落實在生活日用中，回歸春風春雨的潤物發榮，映現出天不言而造化流行的自然法則，並以《論語·先進第十一》所載錄的師生言志，認定所有的學理建構與施政作為，都在尋求一個太平安樂的生活空間，在孔子弟子中並不耀眼的曾點，乃能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50]，獲得孔子青睞，說明太平安樂並非難以達成的目標，人人只要能順性得時，即可享有如春風浴沂般的詩意棲居生活。李穡更直接以“舞雩風詠吾家事”（《用前韻》，a_004_151b），展現其實踐典範的工夫，如《過柳巷飲，醉歸有作》之二云：“東風浩蕩入茅簷，老牧春詩日日添。元氣周流曾不歇，已知和暢及飛潛。”（a_004_142b）李穡以大量的詠春之作，映現出年復一年的四季流行，沉酣在浩蕩春風中，日日有新詩。即使是有病在身，依然不改春風浴沂的心境，如《自信》云：“病中身已憊，默默省吾心。具體天然妙，逢原自得深。莫春曾點瑟，流水伯牙琴。所樂誰能識，清風蓋古今。”（a_004_382a）生病的身體疲憊感，不曾妨礙心靈的暢達，善體順性得時的自然法則，自可跳脫暮春流水的傷春歎逝俗調，檢視歷史長流，曾點言志的春風浴沂，再加上伯牙鼓琴的志在流水，都在浩蕩清風中連結成一片生存樂境。而這一片清風，也未必只在春天吹拂，如《有感》云：

閑知芳草尋常有，靜愛浮雲自在行。物我兩間看得透，自然心迹頓雙清。古人今人若流水，文章道德知誰雄。新秋涼氣滿天地，煙水沙月相爲籠。身閑便是此心閑，胡不佩壺携冠童。（a_004_324a）

芳草浮雲都是尋常物，也都各自榮枯來去。李穡先以“閑知”、“靜愛”的個人覺知與品味，建立物我相親相得而又能自遂其性、自得其所的生存樂境。接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發：文章

道德看似建立在以新變求代雄的規則上，實則人類文明史只成了一部不斷被取代的更迭史。因此，李穡回歸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的自然法則，隨著春去秋來的時光流轉，浴沂風詠的詩意生活並不僅局限在春天或白日，能夠擁有閑適的身心，不論秋涼天地或煙水沙月，都可以是冠童偕遊的詩意生活。《參差歌》之二更指出：“面對大賓說契闊，為謝造物由來公。梅開自早菊自晚，乾坤何處非春風。”(a_004_316b) 政治上的語言固然有許多推衍空間，李穡則以造物無私作對應，不論是早春的梅花或晚秋的菊花，俱如前一小節所闡釋的時雨潤物景象，依此而言，乾坤自然是處處皆春風了。餘如《靜坐一首》的“靜裏乾坤體得真，冰堆雪積自藏春”(a_004_383b)，《發歎》的“四時和氣皆春風”(a_004_309d)，《有感》的“春生祇在堅冰內，陽動方知大極初”(a_004_261b)等，皆是此意，自然就無須感時傷逝、悲秋傷春了，而生命自可沈酣在詩意生活的樂境中。因此，李詩中著意降低言語的主觀辨析，極力揚升身體的視聽感知，如《漫成》云：

理隱無形如目視，言難動舌已心傳。機關不是吾家事，
坐對南山雨滿天。(a_004_325b)

語言文字難以表達的至理，李穡放棄人為的語言辨析，以一句“坐對南山雨滿天”，任由身體的視聽感知，把自己融入雨的潤澤萬物與山的悠然自在，目擊道成，目視心傳，人與天地萬物乃能同順其性、同遂其生、同得其所、同樂其境。李穡詩中隨處可見類似化境，如：“雨聲滿榻南窗白，靜坐悠然道味濃”(《即事》，a_004_327a)，“綠樹參差鶯語亂，箇中情興儘悠悠”(《曉吟》，a_004_329c)，“想看荷露池波靜，記取松風澗水鳴”(《曉雨》，a_004_333d)，“過了重陽風月好，黃花醉興未曾闌”(《晨興》，a_004_249a)，“心與秋清初去穢，眼因山碧更增明”(《自詠》，a_004_358b)，“閑中今古須涵養，綠樹清風吹鬢絲”(《遣興》，a_004_200a)，“轉得化工無盡藏，清風明月自相隨”(《即事》，

a_004_392b)等,放任身心盡情感知以時變化的物候,展現出各自豐美的清姿,而詩人也就能任憑春去秋來、年華逝水,詩意棲居的生活樂境恒常不變,如《對花有感》所云:“花木園中次第春,石榴紅綻照窗新。浮生自與風光轉,誰問今人與古人。”(a_004_421b0)園中花木順時發榮,古人今人自與風光共流轉,行止歸於自然,最能貼近天心。遂如《雜詠》所云“感時因物暢精神,老我依然世外人”(a_004_229b),做一個無求無機關的世外人,感時因物皆能暢精神。甚至以“天然”自居,如《微雨題六言三首》之二所云:“雨映青山獨立,鶯啼白晝閑眠。身與世俱淡泊,人呼我曰天然。”(a_004_413c)首二句可以有多種組合:雨映鶯啼,青山獨立,白晝閑眠;或者雨映青山,鶯啼白晝,獨立、閑眠皆自得。關鍵在於降低人爲的拘限與牽絆,自然就能貼近天心,如《狂吟》所云:

我本靜者無紛紜,動而不止風中雲。我本通者無彼此,塞而不流井中水。水兮應物不迷於妍媸,雲兮無心不局於合離。自然上契天之心,我又何爲兮從容送光陰。有錢沽酒不復疑,有酒尋花何可遲。看花飲酒散白髮,好向東山弄風月。(a_004_277b)

李穡一方面從自然天性上說,以“靜”與“通”的本性,與自然界的“雲”與“水”作照映:雲因風而流動不止,水因井而閉塞不流,但因為水與雲的無心應物,乃能不迷不局,依然擁有清明的自性。李穡體悟到如此天心,另一方面又以李杜飲酒看花弄風月的故實,包括杜甫與鄭虔的“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醉時歌》,《全唐詩》,卷216,頁2257),仿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而作《早春寄呈伯父》的“草色青青柳色黃,尋春日日祇顛狂。丁寧莫遣花開盡,花欲開時興最長。”(a_004_003a)還有對酌花開、扁舟散髮的李白,以及高卧東山三十春的謝安,都成了達者典範。《幸哉歌》聚焦了更多的典範人物,云:

我當與清風明月共婆娑，我當與青山白雲同吟哦。春風桃李政爛熳，馳我紫騮鳴玉珂。看花遊遍鳳城中，兒童拍手笑老翁。倒著接籬日欲落，歸來半酣雙頰紅。形容太平好氣像，童冠暮春沂水上。當時曾點老而狂，舍瑟起居今可仰。(a_004_153b)

李穡以倒著接籬的白行簡、浴沂風詠的曾點為典範，圍繞著拍手兒童、春服童冠，放情與清風明月、青山白雲、春風桃李共顛狂，共譜太平氣像。而尚想虞唐更成了李穡的老年事業，如《即事》云：“靜坐枯株兀，沈思白日長。蜘蛛時掛戶，鳥雀或登床。僻陋山橫翠，炎蒸雨送涼。老年真事業，渺渺想虞唐。”(a_004_213b)上古的醇樸生活，無需太多人力作為，與蜘蛛、鳥雀同室而處，山為屏，雨送涼，悠然沐浴在自然物候中，如《寂庵記》所形容：“大極，寂之本也，一動一靜而萬物化醇焉。人心，寂之次也，一感一應而萬善流行焉。”(a_005_048c)萬物化醇，物我同生，以人心感應太極，人與萬物各得其自然之妙，萬善乃得以流行。與李穡在三韓所極力倡導的朱子性理之說，特別是朱熹主張的“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51]，恰相呼應，而李穡《伯中說贈李狀元別》的“存天理，遏人欲，皆至其極，聖學斯畢矣”(a_005_083d)，即屬義理的推衍，詩歌則是更為具體的生活實踐。

四、結 語

李穡在詩學傳統的建構上，有意以上古的天人合一觀念為核心，其標舉杜詩為“正宗”的憑據，乃在呼應詩歌源頭《南風》之歌，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特別舉黍與芹為例，強調詩歌作品不能悖離民生，尤在於映現天地一心的

物理。全文先梳理由杜詩典範到落落餘師的唐詩接受，分別從回歸自然法則的學杜逕路、風月無涯的落落餘師兩方面加以論析；進而探討由潤物發榮到順性得時的物候感知，提出潤物發榮的自然物象、順性得時的生活樂境兩個論題。李穡藉由體現杜甫“賦物”而來的自然物候感知，回歸參贊天地化育的自然法則，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浴風舞雩的生存樂境，使勞力所得的農產豐美，與賞心所見的花木扶疏，並列而成爲最深微而親切的詩心，從而跳脫抒情傳統所側重的“傷春”、“悲秋”主題，體現出以春天爲主軸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時的物理。李穡把語言文字難以表達的至理，任由身體的視聽感知與自然相親，目視心傳，建立物我相親相得而又能自遂其性、自得其所的生存樂境，也恰是其朱子性理之說的具體實踐。歐陽玄許爲海外傳衣鉢者，洵非虛言。

（作者：臺灣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注釋：

- [1] 李穡《自叙，錄呈圓齋》有“我少北遊慕華風”句，詳見李穡：《牧隱藁》（韓國文集叢刊本，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年）；又“韓國古典數據庫”（<http://db.itkc.or.kr/index.jsp?bizName=MM>），a_004_283a。《牧隱藁》收錄有《牧隱詩藁》35卷，《牧隱文藁》20卷，以及序文、年譜、行狀、神道碑、碑陰記、畫像贊、賜祭文等生平資料。爲避繁瑣，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隨文加注。
- [2] 李穡父李穀，仕元爲中瑞司典簿。李穡於元惠帝至正元年（1341）中成均試詩科，至正八年（1348）赴大都，以朝官子補國子監生員，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中會試，三月殿試中第二甲第二名，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歸國後,上書言時政,深得恭愍王賞識;洪武元年(恭愍王十七年,1368)一度入獄,洪武二十二年(恭讓王元年,1389)以後更是屢蒙貶宥,以至於卒。參見《牧隱先生年譜》,收入《牧隱先生文集》(a_003_502a)。

- [3] 筆者另有《李穡學詩的幾番轉折及其詩學取徑——〈牧隱詩藁〉研究之一》, (민족문화연구 61 호 [2013.11.30],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頁 41—71)。
- [4] 歐陽玄(1283—1357),號圭齋,元代文史名家,凡六入翰林、兩為祭酒,編修有四朝實錄,同時擔任遼、金、宋三史總裁官。
- [5] 李穡一再言及“尊中國”(《送僕符寶使還詩序》, a_005_075b;《謝復位表》, a_005_091a;《廣通普濟禪寺碑銘并序》, a_005_114a)、“尊崇中國之心”(《請子弟入學表》, a_005_095d0),可見一斑。
- [6] 李詹:《牧隱先生文集序》,收入《牧隱先生文集》(a_003_501a)。
- [7] 如衷爾鉅:《理學“衣鉢海外傳”的歐陽玄——一位久被忽略的朱子學高麗傳宗師》(《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頁83—90)、陳來:《李牧隱理學思想簡論》(《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4期,2006年,頁11—17)、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等,其中林月惠專書《導論: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的開展》,對中國臺灣與大陸學界的韓國儒學的研究成果,有精細剖析。至於學位論文如徐付:《高麗末年儒學家李穡及其〈牧隱稿〉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王方:《高麗詩人李穡漢詩中儒家風範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王喜雙:《李穡漢詩對中國文化的借用形式研究——以〈牧隱詩藁〉卷三為中心》(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等,主要探討李穡對儒家傳統思想、人物典故的接受和應用。專門研究李穡詩的論著,有宋政憲:《陶淵明與李穡詩之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年)、卞鍾鉉:《李穡漢詩의 風格研究》(《韓國學報》19,2006.6, 頁412—437)等,相形少了許多。
- [8] 李吟晨《朝鮮時代朱子學派與實學派對〈論語〉的解釋》,收入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47、48。
- [9] 如云“吟哦殊有味”(《述懷》, a_004_110b0)、“竟日吟不休”(《新春遣興》, a_003_565a)、“一味吟詩老不休”(《自詠》, a_004_052c)、“句迴安樂窩中地,牧隱如今只有詩”(《自詠》, a_004_044d)、“雨滴茅簷夜坐清,寂寥身世

- 獨詩情”(《即事》之三, a_004_091a), “時時謳吟足興味, 詩魔又欲同生死”(《解事漢》, a_004_311b)等。
- [10] 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82年), 卷5, 頁43下。
- [11] 同上書,《論語·述而第七》:“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 夭夭如也。”(卷7, 頁60上)又《論語·鄉黨第十》:“朝, 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卷10, 頁86上)
- [12] “九儒十丐”一詞, 出自謝枋得(1226—1289)《送方伯載歸三山序》與鄭思肖(1241—1318)《鐵函心史》, 雖非實錄, 仍廣為流傳。
- [13] 孟榮:《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本, 臺北: 木鐸出版社, 1988年), 頁14—15。
- [14]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 五南出版社, 2002年), 筆者亦撰有《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中華文史論叢》總94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頁37—72)、《記夢、謁墓與前身——唐宋人學杜的情感徑路》(《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 2010年, 頁125—156)。
- [15] 如“文章可是立功名, 自笑儒冠大瘦生”(《南新店》, a_003_527c), “秋來不耐鱸魚興, 搔首風塵大瘦生”(《送安少監按廉入城迴, 次田起居韻》, a_003_562c), “病客重游大瘦生”(《絕句》, a_004_087b)等。
- [16] 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琴賦并序》題下注引《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臺北: 文化圖書公司, 1969年), 卷18, 頁239。
- [17] 王肅:《孔子家語》(《四部叢刊初編》本,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 《辯樂解第三十五》, 頁41。
- [18] 司馬遷:《史記》云:“夫《南風》之詩者, 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 樂與天地同意, 得萬國之驩心, 故天下治也。”(臺北: 鼎文書局, 1985年), 卷24, 頁1235。
- [19]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離婁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 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十三經注疏》本,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82年), 卷8上, 頁146。
- [20]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收入

-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卷70，頁2735。
- [21]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221，頁2331。為避繁瑣，以下引文採隨文加注卷頁。
- [22] 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7，無頁碼。
- [23] 筆者另撰有《杜甫士/農越界的身份認同與創作視域》，收入《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頁199—280。
- [24] 同注[18]，參見《公孫丑上》（卷3下，頁65—66）、《告子上》（卷11上，頁195）。
- [25]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70，頁3300。
- [26] 陳壽：《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卷13，頁418。
- [27] 同注[3]。
- [28]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告子下》：“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趙岐注云：“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同注[18]，卷12上，頁210）李穡《即事》亦云：“七言警句採唐詩”、“自知古學規模別”（a_004_083b），從不同詩人身上學到不同的規模體式。
- [29]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6引《鍾山語錄》載王安石語：“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37。
- [30] 李白《采蓮曲》原詩如下：“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驄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全唐詩》，卷163，頁1693）
- [31] 李肇《唐國史補》記載：“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中，頁180。
- [32]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公司，1970年），頁172。
- [33] 韓愈《平淮西碑》：“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收入《韓昌黎集·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7，頁274—280。
- [34] 崔致遠《討巢賊檄》，收入董誥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767，頁3537。
- [35] 同注[33]，卷4，頁153—154。

- [36]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云：“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韓昌黎集·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頁311—312）
- [37] 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艷，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全唐詩》，卷520，頁5942）
- [38] 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編校、簡宗梧主編：《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3804—3805。
- [39]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喜以杜甫“沉鬱頓挫”評詞，其評陳維崧詞能沉不能鬱，云：“發揚蹈厲，而無餘蘊，究屬麤才。”（《詞話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卷3，頁9。
- [40] 李穡《古風一首》有云：“庖犧察地理，宣聖繫易辭。艮山滿坤地，東走成高麗。”（a_004_083b）乃從地理位置說明高麗與中原的關係，把人文之源溯自庖羲觀察天文地理而作的八卦，使三韓具有會萃東方人文的地位，從而提出東方之文的建構。參見注〔3〕。
- [41] 如王維《寒食城東即事》有“鞦韆競出垂楊裏”（《全唐詩》，卷125，頁1259），杜甫《清明二首》有“萬里鞦韆習俗同”（《全唐詩》，卷233，頁2577）等。
- [42] 元稹：《元稹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卷56，頁600—602。
- [43]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280—286。
- [44]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1—12。
- [45]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外篇《馬蹄第九》，頁336。
- [46] 同注〔43〕。
- [47] 同注〔42〕，頁133。
- [48] 同注〔42〕，頁89，11—12。
- [49] 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詩的闡釋》摘出荷爾德林詩句：“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36）乃從哲學上顯現存在的意義。
- [50] 同注〔9〕，卷11，頁100。
- [51]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2《學六》，卷13《學七》。

主要引用文獻

古籍：

- 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 王肅：《孔子家語》(《四部叢刊初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元稹：《元稹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
- 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李穡：《牧隱藁》(《韓國文集叢刊》本，首爾：民族文化推進黨，1990年)
- 李肇：《唐國史補》(《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孟榮：《本事詩》(《歷代詩話續編》本，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
-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詞話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
- 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董誥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趙歧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
-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蕭統編撰，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年)
- 韓愈：《韓昌黎集·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簡宗梧主編：《全唐賦》(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東昇出版公司，1970年)
- 近人論著：
- 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
- 張崑將編：《東亞論語學·韓日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年)
- 衷爾鉅：《理學“衣鉢海外傳”的歐陽玄——一位久被忽略的朱子學高麗傳宗師》
(《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頁83—90)
- 陳來：《李牧隱理學思想簡論》(《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卷第4期，2006

年,頁11—17)

廖美玉:《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

廖美玉:《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中華文史論叢》總9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7—72)

廖美玉:《記夢、謁墓與前身——唐宋人學杜的情感徑路》(《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八期,2010年,頁125—156)

廖美玉:《李穡學詩的幾番轉折及其詩學取徑——〈牧隱詩藁〉研究之一》(민족문화연구 61 호 (2013. 11. 30),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頁41—71)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

The Inheritance of Abroad: The Acceptance of Tang Poetry and the Perception of Weather in Li Se's "*Mu Yin Shi Gao*"

Liao Mei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Chia University)

Abstract:

Li Se was a Korean scholar and learned to write Chinese poetry at the age of fourteen. He was a man of gifts. He was good at outstanding observation of natural scenery. Besides, he once studied and employed in China in his early life. Because of this experience, he encountered dynastic changes in both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transition of Yuan and Ming in China and the transition of Gao Li and Li Chao in Korea. Th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became the treasure of his poetry. Intriguingly, Li Se studied the philosophy of Zhu Xi. His poetry met with Ou Yang Xuan acceptance. Meanwhile, Li Se's poetry had said he learned and inherit of China poetry. Li Se admired Li Bai and Du Fu as much as he respects Zhu Xi and Cheng Yi. All of them were honored by Li Se and become the cultural heroes in his mind. As for the poetics, Li Se considered *Nan Feng* to be the origin of Chinese poetry. In this poetry, it was his convictions that we should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just like people in the ancient time. Thus, his poetry embodied the blessings in spring and avoided the "sadness of autumn/spring" in poetic tradition. He

certainly was recognized as the important poet who represented the Chinese culture in Korea.

Keywords: Li Se, Tang Poetry, Inheritance of Abroad, Perception of Weather, Accordance with Nature